

论哈马斯生存的社会基础与影响

陈天社

(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 要: 20多年来, 哈马斯作为具有鲜明伊斯兰色彩、反对以色列和巴以和谈的激进组织能得以生存, 主要原因在于: 巴勒斯坦贫穷、落后、濒临崩溃的经济为哈马斯的生存提供了肥沃土壤; 无望的巴以和谈, 为哈马斯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契机; 哈马斯具有深厚的宗教和思想基础。哈马斯的兴起, 导致了巴勒斯坦人的分裂, 阻碍了巴以和平进程, 加深了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裂痕。从根本上讲, 哈马斯不能被武力清除的原因在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延续。

关键词: 哈马斯; 以色列; 巴勒斯坦问题

中图分类号: K3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04(2009)05-0162-04

哈马斯(Hamas)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阿拉伯语首写字母的缩写。1987年被以占领地区巴勒斯坦人起义爆发后, 该组织由巴勒斯坦穆斯林兄弟会著名领导人阿赫马德·雅辛(Ahmad Yassin)创建于加沙。哈马斯有鲜明的伊斯兰色彩, 其基本纲领《哈马斯宪章》充斥着《古兰经》经文和圣训, 它自称“不同于其它伊斯兰组织, 忠于真主, 以伊斯兰为生活之路, 为在巴勒斯坦每一寸土地上提高真主的行为而工作”[1](P80)。哈马斯的口号是:“真主是最终目的, 先知是榜样, 《古兰经》是宪法, 圣战是道路, 为真主献身是最崇高的理想。”[1](P81)该组织的最高奋斗目标是在整个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以沙里亚法为指导的政教合一的国家。哈马斯以坚决反对以色列和巴以和谈著称。《哈马斯宪章》指出:“巴勒斯坦是伊斯兰瓦克夫, 任何阿拉伯国家及其领导人、任何组织、任何巴勒斯坦人或阿拉伯人都无权放弃其任何部分。”[1](P98)“一切和平行动、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国际和会都与哈马斯的原则相违背, 放弃巴勒斯坦任何部分都是对伊斯兰教的背叛。我们不相信这些和会能实现我们的民族权利, 圣战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之路, 所有的和平行动、政治解决方案、国际会议都是浪费时间和徒劳无益的。”[1](P81)

1989年, 以色列将哈马斯定性为恐怖组织(后西方国家也将其列入恐怖组织名单), 长期将其作为主要打击对象。以色列的打击行动虽使哈马斯遭到重创, 包括雅辛和兰提西(Abd al-Rantisi)在内的多名领导人被以色列定点清除, 但总体上讲效果不佳。哈马斯在以色列的重重打击下依然得以生存, 其力量还有所发展, 甚至赢得了2006年巴勒斯坦大选并上台执

政, 2007年6月以来控制着加沙地带。2008年年末, 以色列发动了长达20余天的“铸铅行动”, 哈马斯也并未被清除, 至今依旧坚持不承认以色列、不放弃暴力、不接受巴以已达成协议的“三不”立场。哈马斯为何在以色列长期打击下得以生存? 该组织对中东政治有何影响? 本文试就此作一探讨。

一、哈马斯生存的社会基础

1. 巴勒斯坦贫穷、落后、濒临崩溃的经济, 为哈马斯的生存提供了肥沃土壤

1967年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被以色列占领后,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经济一直推行限制政策, 导致巴勒斯坦经济畸形发展, 严重依赖于以色列, 成为以色列经济的廉价劳动力提供者、商品和原料市场, 巴勒斯坦人生活非常困难。1993年巴以签订《奥斯陆协议》之后, 巴勒斯坦经济并没有多大起色, 呈不断恶化趋势。2000年9月巴以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以来, 巴勒斯坦经济濒临崩溃。巴勒斯坦2006年人均GDP比前一年下降了8%以上, 2007年5月的失业率为25%, 加沙地带的失业率更高达36%[2]。巴勒斯坦经济状况恶化既有国际社会的援助不到位、巴勒斯坦自治当局发展经济不力等多种因素, 也与以色列的封锁不无关系。2004年11月, 负责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事务的世界银行干事奈杰尔·罗伯茨指出:“封锁使巴勒斯坦的经济空间支离破碎, 增加了企业的成本, 排除了经营一家企业所必需的可预见性。”[3]2006年3月哈马斯执政后, 以色列的封锁更使巴勒斯坦特别是加沙地带陷入困境。世界银行2007年5月发表的报告称, 以色列的封锁政策阻碍了巴勒斯坦经济的发展, 使巴勒斯坦人民的工作和生活受到极大限制。报告认为, 以色列采

收稿日期: 2009-04-20

作者简介: 陈天社(1968-), 男, 陕西富平人,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历史学博士, 主要从事中东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

取的措施已超过其安全的需要,如果再继续下去,巴勒斯坦经济将更加糟糕[2]。然而甚至是在2008年6月-12月哈马斯与以色列停火期间,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也依旧。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工作署行动总监约翰·京(John Ging)指出:“停火协议并没有使加沙居民得到什么好处,他们的尊严生活依然受到剥夺。事实上,在这段期间,我们对加沙的物资供应亦颇受限制,我们甚至缺乏粮食,处境十分困难。”[4]

贫穷、落后、濒临崩溃的经济,激发并孕育了巴勒斯坦人特别是在被占领土上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的强烈抗争意识。他们已无法忍受统治,再也不想重复其父辈的命运,主张以激进方式改变现状,武装反以行动就成为激进的巴勒斯坦人斗争的首要选择。早在2001年,一巴勒斯坦评论家就指出:“加沙、西岸再关闭下去,我们无以果腹,可就要吃(犹太)人了。”[5](P55)可以说,巴勒斯坦的困境为持强硬立场的激进组织的生存和活动提供了肥沃土壤。哈马斯的崛起,就是巴勒斯坦人力图改变现实困境和日益高涨的激进抗争意识的反映。同时,哈马斯成员尤其是那些自杀性袭击者舍身成仁的“民族斗士”形象,对处于绝望中的巴勒斯坦人,特别是对那些激进的巴勒斯坦青年有强大的感召力。因此,哈马斯在混乱的巴勒斯坦社会如鱼得水,其主张在巴勒斯坦人心中产生了强烈共鸣。另外,哈马斯建造清真寺、学校、医院和救济巴勒斯坦烈士等一系列社会活动,也使处于困境中的巴勒斯坦人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帮助。加沙地带比约旦河西岸还要糟糕的经济状况,使其成为哈马斯的大本营。一位记者对此指出:“在没有出路的大监狱里,加沙居民变得绝望暴躁,容易受激进思想影响,哈马斯也因此在该地起家。当笔者身在加沙,发觉哈马斯已构成加沙居民生活一部分,从哈马斯医院、哈马斯大学到哈马斯小区中心,居民在困苦生活上依赖哈马斯的程度可想而知。可以预见,只要加沙越受封锁,经济越变萎缩,人民越无路可退,哈马斯的地位便越稳固。”[4]

2 无望的巴以和谈,为哈马斯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契机

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订以来,巴以相继达成了多个和平协议。但巴以和平进程荆棘丛生,步履艰难,巴勒斯坦问题至今未得到解决。巴勒斯坦被以色列占领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观,和平进程已成为巴勒斯坦人一味难以下咽的苦涩药剂。

其一,由于实力悬殊,巴勒斯坦方面在和谈中往往比以色列作出更大程度的让步。在奥斯陆谈判中,巴解组织正式放弃了它成立以来一直坚持的一些基本原则,如明确承认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生存权,同意删除巴勒斯坦国民宪章中有关消灭以色列的条款,宣布放弃恐怖和暴力活动,同意搁置耶路撒冷等关键问题等。在1998年达成的《怀伊协议》中,巴勒斯坦方面再作妥协,放弃了自己提出的以色列应从西岸撤军30%的要求,接受了美国提出的撤军13.1%的方案。尤为重要

的是,巴勒斯坦方面答应制定镇压巴勒斯坦人抗以暴力斗争的行动计划和时间表,组建美、以、巴三方安全委员会,同意让美国中央情报局插手镇压行动。有学者认为,这实际上改变了作为马德里的会基础和《奥斯陆协议》所遵循的“土地换和平”的原则,把以色列撤军同巴勒斯坦方面采取具体安全措施挂钩,把保证以色列安全作为撤军的条件,实现了时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主张的“以安全换和平”原则[6](P42)。但就是在巴勒斯坦方面不断作出重大让步而达成的协议,以色列也以种种理由进行修改、不有效履行。1996年后,巴以达成和平协议难,履行更难。2000年7月,美国总统克林顿极力倡导的巴、以、美戴维营首脑会晤也以失败告终。2000年9月,以色列利库德领导人沙龙强行访问阿克萨清真寺,点燃了巴以武装冲突之火。此后,以色列先后经历了沙龙政府、奥尔默特政府及现在的内塔尼亚胡政府,巴以之间虽也有一些接触,国际社会也做出了许多努力,但巴以和谈始终没能取得什么进展,巴以和平进程名存实亡。2009年新上台的内塔尼亚胡政府,甚至连被国际社会广泛支持的“两国方案”也迟迟不表态予以认可。

其二,巴勒斯坦民族权益不断被侵犯。在巴以奥斯陆进程开启后,以色列一方面与巴勒斯坦人进行和平谈判,另一方面却又不断侵犯巴勒斯坦民族权益。内塔尼亚胡1996年执政后,废除了工党政府冻结犹太人定居点的禁令。1997年4月,他批准在约旦河西岸建造5000套住房,鼓励犹太人去定居。他还批准旨在使耶路撒冷犹太化的哈尔霍马山犹太人定居点计划,下令开通阿克萨清真寺地下隧道新出口。2001年沙龙上台后,以色列公然以武力多次入侵巴勒斯坦控制区,甚至攻打阿拉法特总统府,围困阿拉法特。沙龙政府还以防止巴勒斯坦人自杀性袭击为由修建隔离墙,将许多巴勒斯坦土地圈在以色列一边,试图造成既成事实。2005年8月,以色列单方面从加沙撤军,但又随时进入加沙打击巴勒斯坦人。2008年年末,以色列大举进攻加沙,造成六千多无辜巴勒斯坦平民伤亡。

巴以和谈中巴勒斯坦方面的步步退让与以色列的得寸进尺,使巴勒斯坦人对巴解组织奉行的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道路备感失望,对其前景也丧失信心。与巴勒斯坦自治当局的一再妥协和饱受屈辱相比,哈马斯的武装行动对激进的巴勒斯坦人有极大的吸引力。可以说,哈马斯力量的增长反映了巴勒斯坦人对和谈的不满和失望情绪。巴勒斯坦民意测验也印证了这一点。每当和谈取得突破,哈马斯的支持率就会降低,而当和谈陷入僵局时,其支持率就会反弹。2006年哈马斯赢得巴勒斯坦大选,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巴勒斯坦人对巴勒斯坦自治当局政策失望和不满的表现。

3 哈马斯具有深厚的宗教和思想基础

经济上的困境、对现实的不满以及对未来的忧虑,使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纷纷把目光转向曾给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带来无限荣耀的伊斯兰教,寻求宗教常能

提供的心理安慰、力量和忍耐力。正如哈马斯已故精神领袖雅辛所言：“当所有的门都关闭时，安拉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7]（P227）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被占领土上清真寺数量增加、巴勒斯坦人社会生活伊斯兰化趋势加强及伊斯兰组织的力量壮大，表明被占巴勒斯坦领土的伊斯兰回归倾向显著增强。在伊斯兰教早已深深扎入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领域的巴勒斯坦，哈马斯鲜明的伊斯兰色彩，使其很容易得到巴勒斯坦人的认同和宗教心理上的共鸣。此外，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和圣训中许多敌视犹太人及要求同犹太人战斗的经文和圣训，也为哈马斯号召对犹太人和以色列进行斗争提供了合法的宗教依据。可见，哈马斯的伊斯兰主张和武装反以行动，是巴勒斯坦人以传统的伊斯兰教来改变现状的尝试，迎合了被占领土向伊斯兰教回归的倾向，是巴勒斯坦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表现。

哈马斯有比较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古兰经》和圣训是哈马斯的直接理论来源，《哈马斯宪章》传单、领导人讲话等大量引用《古兰经》经文及圣训。此外，哈马斯还受埃兹丁·喀萨姆和赛义德·库特卜激进思想的影响。喀萨姆（1881–1935）是叙利亚人，曾拜师著名伊斯兰主义思想家穆罕默德·阿布杜，因在叙利亚从事反对法国殖民者的活动而被缺席判处死刑，后逃到巴勒斯坦，又积极从事反对英国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活动，1935年在同英国殖民者斗争中殉难。他宣称流血、革命是自由独立之路，提出了“一手拿《古兰经》一手拿枪”的口号[1]（P98），被誉为巴勒斯坦武装斗争之父。哈马斯继承了喀萨姆的思想，将其武装组织命名为“埃兹丁·喀萨姆支队”，足见他对待哈马斯的影响力。库特卜（1906–1965）是埃及人，被誉为当代最著名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家之一，1965年被处死。他猛烈抨击阿拉伯世俗民族主义者，号召穆斯林为建立伊斯兰秩序而向一切非伊斯兰的事物和行为作战，为真主的事业献身，称“所有为实现真主愿望的献身者，都是殉道者，都将升入天堂”[8]（P78）。受其思想的熏陶，哈马斯处处以世俗的巴解组织反对派的面目出现，反对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任何方案，始终不放弃武力。

此外，哈马斯在困境下能得以生存，还与外部伊斯兰势力的支持密切相关。

二、哈马斯对中东政治的影响

1 哈马斯加剧了巴勒斯坦内部的分裂

自建立时起，哈马斯就是以巴解组织竞争者的面目出现的，是与巴解组织所主张的世俗主义相对立的伊斯兰主义的主要代表，是巴勒斯坦反对巴以和谈的主要力量之一。政治理念的差异，使哈马斯与法塔赫、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屡发冲突。这两个派别的内斗，导致了巴勒斯坦人的分裂。2007年6月以来，两派的冲突使巴勒斯坦形成哈马斯控制加沙、法塔赫控制约旦河西岸的割据局面。在2008年末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军事进攻后，尽管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

斯及法塔赫指责以色列的攻击行动是犯罪行为，但他们同时也坚持认为哈马斯应该对此负有责任。而哈马斯反击并指责阿巴斯和法塔赫是以色列的合作者。流亡在叙利亚的哈马斯政治局主席马沙尔甚至号召支持者在约旦河西岸发动起义，以“对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进行和平反击，对以色列进行军事反击”[9]。正如美国《洛杉矶时报》所评论的：“巴勒斯坦各派别武装在对抗以色列问题上原本是一致的，但由于法塔赫希望采用和平方式而哈马斯主张使用武力，这种团结局面被人为撕裂了。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展开的军事行动，使得主张和平反抗以色列以及武装反抗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士之间分歧进一步加剧。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自治区，由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领导人不满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区死亡人数不断上升，他们派出警察镇压了亲哈马斯的民众游行和抗议。在拉马拉的街道上，（2009年元月2日）共有约2000名手持哈马斯绿色旗帜的支持者上街游行，而与此同时，约500名法塔赫的支持者也走上街头，支持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主张和采取的行动。”[10]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政治评论家、资深编辑胡萨姆也指出：“在巴勒斯坦历来存在一种现象：越是被以色列方面打击的一方，越能在民众中获得支持。战争结束后，巴勒斯坦内部接下来面对的问题将是展开和解对话和举行大选的问题。如果届时哈马斯的支持率上升，那么这将对法塔赫及其对西岸的控制产生负面影响。”[11]2007年6月哈马斯与法塔赫发生冲突以来，阿拉伯国家为促进巴勒斯坦民族和解做了许多努力，但在埃及举行的巴勒斯坦民族和解对话会议也数度中断，足见两派的裂痕有多深。

巴勒斯坦人内部的分裂，为以色列打击哈马斯提供了良机，而巴勒斯坦人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打击，又进一步削弱了巴勒斯坦方面的力量。国内学者余国庆对此有精辟分析：“加沙的战火不仅沉重打击了哈马斯，法塔赫的政治号召力也将大打折扣，而巴勒斯坦的政治资源和建国事业的损失更是难以估量。加沙战火燃起后，阿巴斯只能在国际上奔走呼吁调停，以色列似乎也并不担心法塔赫在西岸开辟‘第二战场’。法塔赫的无所作为并非超然，而是无奈的表现。当法塔赫的警察在约旦河西岸用水龙头和催泪瓦斯对付抗议以色列军事行动的示威群众时，法塔赫能否代表巴勒斯坦人的利益再度成为疑问。一旦战火停歇，加沙民众显然难以接受对以色列入侵束手无策的法塔赫回归加沙。因此，在今后的巴以和谈中，法塔赫的政治资本将会降低，政治自信毫无疑问将要下降。”[12]

2 哈马斯阻碍了巴以和平进程，加深了中东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裂痕

由于诸多原因，巴以和谈步履艰难，而哈马斯与法塔赫的内斗，削弱了巴勒斯坦力量，使本已处于劣势的巴勒斯坦方面更加虚弱，在巴以和谈中没有多少与以色列讨价还价的力量。同时，哈马斯的反对及屡屡破

坏行动,使本已来之不易的巴以和平协议更加难以履行。此外,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挑衅,为以色列封锁和打击巴勒斯坦人提供了口实,而以色列的武力反击及造成大量无辜平民伤亡,又使巴以双方的矛盾加深,从而增加了巴以和解对话的难度。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打击还增加了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仇恨,激发了阿拉伯民众的反以浪潮。近年来,中东各地风起云涌的民众反以游行示威就是例证。阿拉伯民众对以色列打击巴勒斯坦人的愤怒,使一些阿拉伯国家深感压力。在2008年末加沙冲突爆发后,约旦召回了驻以色列大使,卡塔尔决定冻结与以色列的关系,毛里塔尼亚中断了与以色列的关系,阿以关系进一步恶化,这显然不利于阿以和解。

哈马斯还加深了中东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裂痕。哈马斯兴起后,得到伊朗、叙利亚等国及一些伊斯兰组织的支持,而埃及等许多阿拉伯国家出于对本国伊斯兰激进势力的戒备,对哈马斯持冷淡立场,这使阿拉伯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分歧加大。如本次加沙冲突爆发后,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在谴责以色列军事行动的同时,也批评哈马斯武装分子不顾各方警告一再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为以色列发动进攻制造了借口。而阿拉伯世界部分激进组织和民众则批评埃及当局是以色列封锁加沙的“帮手”,指责埃及对巴勒斯坦人支持不够,呼吁埃及完全开放加沙边境的拉法口岸。在一些阿拉伯国家,爆发了反对埃及的示威游行,甚至埃及驻也门等一些阿拉伯国家的部分使领馆也遭到冲击。卡塔尔等少数阿拉伯国家不顾埃及、沙特阿拉伯的反对,于2009年1月16日坚持召开了阿拉伯首脑会议,且邀请伊朗和哈马斯领导人与会,更是凸显了阿拉伯内部的分歧。另外,在阿拉伯国家中,许多民众支持哈马斯,而政府立场谨慎,这使这些国家政府面临民众的巨大压力。阿拉伯世界的分歧,使其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软弱无力。而没有阿拉伯世界的支持,巴勒斯坦的地位和实力更加虚弱。

综上所述,哈马斯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其有深厚的社会基础,而巴勒斯坦问题的久拖不决,则是哈马斯不能被消灭的根本原因。正如香港《明报》刊文所指出的:“以巴冲突的根源,在于以色列无视联合国决议,长期控制约旦河西岸及加沙,不让他们建国,巴勒斯坦人是迫不得已才要反抗。战争只会加深双方积怨,即使以色列击溃哈马斯在加沙的势力,以军占领加沙每一幢建筑物,杀死所有哈马斯成员,只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政策没有调整,另一个哈马斯又会冒起,除非以色列永远对加沙实施军管。以色列一定要与哈马斯对话,就像当年与阿拉法特谈判一样,才可以保障和平。”^[13]因此,以色列的武力无法清除哈马斯,有可能适得其反。正如德国之声记者莱纳索里奇所指出的:“以色列对这一点是不能抱任何幻想的:哈马斯的实力即使暂时被削弱,但不管怎样仍然十分危险。当前的事态发展甚至可以让它在道义上得到加强,即使在约

旦河西岸也能得分。从长期看,哈马斯可以承受人员和基础设施的损失,甚至可以承受暴力结束其对加沙地带的控制。唯一能给哈马斯带来实质威胁的,恰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处境能够明显改善,以及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中东冲突解决方案。”^[14]从近期发展趋势来看,哈马斯似不大可能改变其强硬的反以立场。强烈反对以色列,是哈马斯获得许多巴勒斯坦民众支持的主要原因。在目前巴以和平进程陷于困境,巴勒斯坦人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情况下,哈马斯的支持率还有所上升,不大可能改变其立场,并且当前的以色列当局也无意改变其对哈马斯的政策。因此,主客观方面都尚不具备哈马斯改变立场的前提条件。

参 考 文 献

- [1] Ziad Abu- Amr. Islamic Fundamentalism in the West Bank and Gaza. The Muslim Brotherhood and the Islamic Jiha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 [2] 黄培昭. 巴勒斯坦经济状况堪忧 [N]. 人民日报, 2007-05-15.
- [3] 新浪网. 巴勒斯坦经济极度困难近半数人在贫困线以下 [EB/OL]. <http://www.sina.com.cn> 2004-11-24.
- [4] 张翠容. 加沙战火: 炸回到1948年之前? [J]. 香港亚洲周刊, 2009 (2).
- [5] 黄培昭. 巴勒斯坦经济特点及当前的经济形势 [J]. 阿拉伯世界, 2001 (3).
- [6] 陈佩明. 试析怀伊协议的产生、影响与后果 [J]. 西亚非洲, 1999 (1).
- [7] Chery A. Rubenberg. Twenty Years of Israel Economic Policies in the West Bank and Gaza. Prologue to the Intifada. Journal of Arab Affairs, 1989, 8 (1).
- [8] Yvonne Y. Haddad. Sayyid Quthb: Ideologue of Islamic Revival in John L. Esposito, ed., Voices of Resurgent Islam. New York, 1983.
- [9] 凤凰网. 哈马斯称将严惩与以色列合作的法塔赫成员 [EB/OL]. http://news.ifeng.com/world/special/jiasha/news/200901/0104_5302_952651.shtm 2009-01-04.
- [10] 凤凰网. 美媒称以军进攻加沙导致巴勒斯坦派别分歧加剧 [EB/OL]. http://news.ifeng.com/mil/3/200901/0104_341_952363.shtm 2009-01-04.
- [11] 人民网. 国际观察: 加沙冲突搅动中东关系 [EB/OL]. <http://world.people.com.cn/GB/8655466.htm> 2009-01-10.
- [12] 余国庆. 加沙战火重创巴政治前途 [N]. 新京报, 2009-01-18.
- [13] 庄晓阳. 一个哈马斯倒下, 另一个哈马斯冒起 [N]. 香港明报, 2009-01-07.
- [14] 凤凰网. 德国媒体称以色列不可能从军事上战胜哈马斯 [EB/OL]. http://news.ifeng.com/world/special/jiasha/news/200901/0104_5302_950988.shtm 2009-01-04.

(责任编辑 郑良勤)